

黄宗羲对君主专制的批判思想探赜

王兴乐

聊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山东聊城, 252000;

摘要: 黄宗羲在君主和天下的主客关系、君臣关系、公法私法关系对君主专制进行了批判。传统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响, 与明清之际君主专制下所暴露出的严重弊端构成了其批判君主专制思想的生成逻辑。黄宗羲的政治主张带有明显的进步性, 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研究黄宗羲的对君主专制的批判思想, 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 完善基层治理, 推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关键词: 黄宗羲; 君主专制; 君民关系; 民本思想

DOI: 10. 64216/3080-1486. 25. 03. 034

黄宗羲, 字太冲, 号南雷, 浙江余姚人, 生于 1610 年, 明末清初思想家, 其所作的《明夷待访录》既是晚明的经典著作, 也是整个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一部名著。

1 黄宗羲批判君主专制思想的主要内容

1.1 批判君主将天下为主君为客, 转变为君为主天下为客

在君主与天下的主客关系时, 黄宗羲认为“古者以天下为主, 君为客”, 与君主起源相对应, 三代的君主是为了拯救万民苍生, 为天下之公利而服务的, 君主设置的意义就是使百姓幸福, 可以实现自己私利, 使得天下安宁。黄宗羲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政治主张, 已经超越了中国传统的君君臣臣的政治思想, 是对君主专制的猛烈抨击。秦统一中国后, 封建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不断加强, 中国几千年的帝相之争在朱元璋时期也宣告结束, 宰相制的废除, 东厂西厂、锦衣卫的设立进一步扩大了君主权力, 清朝承袭明朝, 设立军机处, 使得君主专制真正达到顶峰。这些现象背后都是因为君主将其与天下的主客关系颠倒, 君主成为了天下的大害。

1.2 批判君主将与大臣的平等关系, 转变为上下之间的主奴关系

在《原臣》一章中, 黄宗羲探讨了大臣的职责, 及其与君主的本质关系。黄宗羲认为, 大臣的产生不是为君主服务的, 是为了天下万民, 因为天下之大, 君主无法一人单独治理, 即“缘夫天下之大, 非一人之所能治。”黄宗羲认为一个大臣, 就应该是君主强迫自己做不合理的事情时, 即使献出自己的生命也不会去做, 应以天下万民福祉为己任。黄宗羲进一步指出“为臣者轻视斯民

之水火, 即能辅君而兴, 从君而亡, 其于臣道固未尝不背也”, 一个大臣如果不把人民苦难当做一回事, 即使能辅佐君主取得天下, 或者跟随君主一起牺牲, 这也是背离了为臣之道。既然大臣的职责是为天下百姓谋益, 君主的本质也是与天下苍生为己任, 因此黄宗羲进一步指出君主与大臣本质上是一样的。黄宗羲进步打破传统三纲五常, 指出君臣关系绝不是君父臣子, 父子关系是一种血缘关系, 父对子具有生养之恩, 但是君臣没有这种血缘关系, 君主与大臣只是因共同治理天下而联系在一起, 不是一种君父臣子的纲常关系。三代以后的君主, 背离了君臣关系的本质, 挑选大臣只在乎是否能为自己效劳, 不在关心天下百姓, 想要做官的人, 便只以奉承君主为己任, 君臣关系转变成了主奴关系, 即“跻之仆妾之间而以为当然”。

1.3 批判君主在法治方面的一家之法、非法之法

在《原法》开篇, 黄宗羲便指出“三代以上有法, 三代以下无法”, 他认为尧舜禹, 甚至后面的商汤、周文王是为有益天下百姓而设立的, 如分田给百姓, 开办学校教化百姓、收税养兵, 保卫百姓等, 这些都不是为君主个人制定的。但后世君主“后人之主, 既得天下, 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 子孙之不能保有也, 斯患于未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 一家之法, 而非天下之法也”, 黄宗羲认为后世的君主如秦始皇设立郡县制是因为郡县制对其有利; 汉初大封诸侯王, 是因为诸侯王可以保卫皇室; 宋朝解除方镇兵权, 是因为其威胁皇权, 这些法律不是为民众打算的, 仅仅是为了一家一姓的利益, 根本不能算做法。黄宗羲认为三代的法, 是把天下当作天下人的天下, 后世的法, 是把天下当作君主的私

产,如同藏在箱子里一样。天下都知道权力掌握在君主一人手中,君主时时刻刻都在恐惧权力的丧失,因此不得不制定严密法度,“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黄宗羲极力批判这种所谓“非法之法”,它们摒弃了三代之法,以后世君主私利为立法初衷,以严密法度束缚人民,一定会导致最终的祸乱。

2 黄宗羲对君主专制批判思想的产生逻辑

2.1 理论逻辑: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响

黄宗羲对于君主专制的猛烈批判,在理论上首先来自于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孟子民本思想的影响。

中国的民本思想是一种深植于中华文化传统的政治哲学,其核心理念是“民为邦本”。民本思想强调,国家的兴衰与人民的福祉密切相关,因此统治者应当尊重和 protect 人民的利益。论语中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君主采取德政治理国家,君主就会像北极星一样,被众多星星包围拥戴,这里的德政也可以指君主按照一定的规范办事,不违犯政治伦理道德。在论述君主与民众关系时,孟子进一步指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孟子认为天下的百姓是最重要的,江山社稷居于第二位,君主是三者中的最次地位,这就是“民贵君轻”思想,孟子的思想在当时影响了荀子的“民水君舟”,也直接影响了黄宗羲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轻”的政治主张。在孟子民本思想中,百姓居于十分重要的位置,随着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的逐渐加强,到了明朝后期,君主逐渐荒淫无道,君主专制下的政治制度残害人民,禁锢百姓天生的私欲,因此黄宗羲以传统儒家民本思想为理论依据,结合明朝灭亡的现实教训,提出了自己对君主专制的批判思想。

2.2 现实逻辑:明朝中后期君主专制的弊端逐渐暴露

黄宗羲生活在明末清初,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动荡。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黄宗羲对于君主专制批判的思想应运而生。

明清时期,是中国君主专制发展到顶峰的一段历史时期,封建君主专制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封建统治集团的腐败使得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明太祖废除宰相制,使得六部直接由君主主导,加强了君主专制,相权的消

失导致皇权高度集中,皇帝失去了有效且有限的制衡力量,高度集中的权力会产生腐败,乃至暴政。明朝中后期,皇帝疏于朝政,皇权被阉党集团所把持,形成了宦官专权,加重了政治腐败与政治危机。明朝末期,加之天灾不断,大批流民无家可归、流离失所,李自成的农民起义触动了明朝的统治根基。

在黄宗羲的个人经历层面,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因参与东林党人反对魏忠贤的专制而受迫害,黄宗羲本人,也曾经多次参与抗清斗争,但都以失败告终,黄宗羲便对君主专制由失望绝望产生了憎恨,以著书立说为人生追求,多次拒绝康熙的出仕聘用。黄宗羲对于君主专制的批判也是对于明朝灭亡的一种反思。

3 对黄宗羲批判君主专制思想的辨析

黄宗羲的反对君主专制思想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其对于君主专制的猛烈批判带有明显的进步性,但也有其历史局限性,下面将从其思想的进步性与局限性两方面进行论证分析。

黄宗羲对于君主专制的猛烈批判带有进步意义。首先在君民关系的论证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黄宗羲站在主客角度,把民众放在主体立场,这是过去儒家传统君民关系所无法提出的,这是黄宗羲政治思想的一大进步特性。其次在君臣关系上,黄宗羲强力批判君臣关系是一种绝对的主奴关系。黄宗羲指出君臣都应应以天下万民苍生为己任,大臣不能盲目顺从君主,君臣应协同合作,黄宗羲前所未有的打破了君主臣从的角色定位与君父臣子的伦理纲常,这也是其一大进步意义。最后,黄宗羲在法治上面主张“天下之法”,批判君主的“非法之法”。黄宗羲以黎民百姓利益为重,反对君主私利,倡导实行公法,这也是其反对君主专制思想的又一大进步意义。

黄宗羲对于君主专制的批判思想也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在其著作《明夷待访录》中,黄宗羲主张应当学校不仅是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场所,还应是一个公共舆论机关,可以进行议政督政,实现“公是非于学校”;黄宗羲还主张应当恢复宰相制,任命贤能的人担任宰相,成为制约君主的重要力量。首先,黄宗羲的这些主张只不过是对于未来政治社会的一种构想,并没有付诸实践,具有理想性。其次,黄宗羲虽然大力批判君主专制,却并没有主张废除君主制,他仍然倡导良善贤能的君主制,想要回到三代尧舜禹汤时期的政治社会,因此他的政治

主张仍然是对君主制度的修补与完善。最后,在君民关系的主张上,黄宗羲虽然带有明显的进步性,但是黄宗羲对于“民”的看法仅局限于整体上的民众,忽视了个体民众的能动作用,这也是其思想的一个局限性。黄宗羲批判君主专制思想的局限性与中国社会长期的小农经济是分不开的,在小农经济主导下的中国,很难实现新的阶级突破,因此黄宗羲的思想局限性也是正常的,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4 结论

黄宗羲对于君主专制的批判思想带有明显的进步性,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应当对其辩证分析。黄宗羲的政治思想是明末清初的时代产物,他对于君民关系的批判与主张值得后世深入研究。人民是社会历史的主人的唯物史观,在今天早已牢牢确立,但在几百年前的明朝末年,黄宗羲率先从主客角度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轻”,其政治思想影响深远。实现社会和谐,基层治理的完善乃至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都必须坚持人民主体性,尊重人民,因此研究黄宗羲的政治思想具有其特殊意义。

参考文献

- [1] 黄宗羲. 明夷待访录. [M]. 段志强, 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2] 论语. [M]. 杨伯峻, 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7.
- [3] 孟子. [M]. 方勇, 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 [4] 王新雅, 李增元. 论黄宗羲的政治思想及其对当代社会治理的启示[J]. 山东行政学院学报, 2015, (02): 45-51.
- [5] 郭厚安. 论明清之际对君主专制的批判[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5, (05): 1-8.
- [6] 吴光. 论黄宗羲新民本思想的性质、内容、渊源及其现代意义[J]. 孔子研究, 2009, (02): 12-21.
- [7] 刘华安. 黄宗羲君主政治理论中的“协同治理”思想探析[J]. 浙江社会科学, 2010, (09): 72-77+127.
- [8] 徐进. 黄宗羲的民本思想及其对限制专制君主的构想[J]. 文史哲, 1992, (01): 38-42.
- [9] 允春喜. 黄宗羲民本思想的理论渊源[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0(02): 45-49.
- [10] 陈来. 黄宗羲民本思想的现代意义[J]. 浙江学刊, 2005, (04): 8-9.
- [11] 潘起造. 论黄宗羲新民本思想的启蒙意义及局限[J]. 浙江学刊, 2006, (05): 83-89.
- [12] 张师伟. 中国传统行政的善治理想及其现代影响——以黄宗羲为例[J]. 东方论坛, 2021, (02): 1-14+165.
- [13] 朱承. 黄宗羲的公共性思想——以《明夷待访录》为中心的考察[J]. 哲学研究, 2020, (04): 72-81.
- [14] 王保国. 孟子民本思想渊源考辨[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04): 86-90.
- [15] 孔新峰. 先秦儒家德性政治理论的初步重构[J]. 孔子研究, 2022, (03): 39-65+158.